

互联网与史学观念变革

[编者按]互联网不仅改变着当代生活,也在记录和创造着历史;它不仅改变了史学研究方式,也影响和改变着史学家。史学家不仅在文献和文物中研究历史,更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感悟历史,因为昨天的生活就是今天的历史。显然,互联网极大地丰富了史学家的历史感受,这种感受必然或多或少地、有意无意地在他们的作品中反映出来。本刊特邀请了几位学者笔谈互联网对史学观念的影响,希望学界更多地关注这个正在影响和促进史学变革的现象。

“网络史学”的神话与实际

李剑鸣(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最近读了一些文章,其中谈到,“网络文学”乃是当今“汉语文坛”最值得关注的现象,带有“文学转型”的意义。相关的讨论和研究早已展开,大有成为一个新研究领域的趋势。可是在史学界,关于“网络史学”的说法不过是偶有所闻,专门的研究文献更不多见。当然,这并不是说史学界对网络技术的重要性视而不见,也不是说研究历史的人不懂得运用网络工具。实际上,我们很早就把网络作为重要的研究手段,以获取资料和交流信息。不过,我们没有像文学界那样,主要把网络作为一个新的发表空间。虽然借网络发表研究成果目前已非鲜见,但似乎还不足以从整体上改变历史写作的面貌。

在谈到网络与史学的关系时,我们可能会首先想到网络所带来的巨大好处,尤其是它极大地拓展了获取资料和信息渠道,也使得对资料的检索和利用大为便利。然则正是在网络平台上出现的资料和信息的共享性,为改变历史研究的方式和性质埋下了伏笔。过去一些机构和个人借助资料便利而取得的学术优势,可能遭到削弱,甚至颠覆。那些原来远离资料与信息中心的人,现在也能接触和利用同样的资料,于是就可能从原来的知识的接受者变成知识生产者。这就无异于敞开了史学的门户,可以接纳更多的参与者,也可能扩大史学作品的数量。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网络世界跟纸质出版界相比,可以说是一个众声喧哗乃至混乱无序的地方。发表之前无须经过身份验证、资格审查和学术评议等程序,这样就难免造成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局面。但是也恰恰由于这种灵活性和随意性,许多“另类的”知识和观点便获得了面世机会,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变得十分便捷。有一些题材由于某些缘故而难以通过纸质媒介发表,而借助网络则可越过这些限制。于是,不少长期被遮蔽或被边缘化的题材,以及一些看来是处在禁区或“雷区”的问题在相对自由的网络空间引起了关注。有

些文章经过网络传播一段时间以后,证明并不存在预想的风险,于是便引起了常规刊物和出版社的注意,最终取得了“合法”身份。韩钢教授近期的一些研究成果,胡宝国研究员的一些学术评论,都经过了这样一个从网络世界进入纸质发表的过程。如果没有网络发表的“预演”,有的作品可能永远难有见天日的机会。

另外,网络还为特定的学术群体或学派的形成提供了可能。在学术史上,曾出现过一些同仁刊物或学派性刊物。但是,目前由于管理和成本的缘故,常规刊物和印刷出版往往难以为学术群体或学派所利用。随着网络世界的拓展,通过学术性网站的运作,有可能把具有相近知识趣味和研究兴趣的学者集合起来,集中发布具有相近取向的文章或材料,以此形成有特色的研究群体,进而培育不同的学术流派。美国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都创办和维持着自己的学术性网站,不少公共性的学术网站,如 H-net 和 historynet.com 等,除了为学者提供功能性服务外,还下设各种专业网络期刊,发表学术性和信息性的电子文本。这就为学术群体或学派开辟了成长的空间。

然则网络世界创造出来的发表自由和简便,在何种意义上改变了历史写作的形式和性质呢?目前可见迹象的一个可能后果是,进一步加剧了历史研究的琐碎化和历史写作的“去宏大叙事化”,给那些介于精深研究和通俗写作之间的文本提供更多的面世机会。借用美国学者罗伯特·伯克霍弗的话说,网络世界有助于历史表述在视角和声音上的多样化。长期以来,专业史家总是力图垄断历史的话语权,但他们始终没有做到这一点。到了网络时代,这种可能性更是一去不复返了。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史学的“民主化”。同政治民主中的商议和决策辩论一样,史学中的“民主”一方面表现为参与者的增多,另一方面则是学术声音的多样化。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要对过去盛行的一些观念做一点反思。首当其冲的无疑是知识绝对主义。我们长期相信,只有“正确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而“正确的”知识往往具有唯一性和稳定性。而且,我们还坚持只有掌握“正确的”知识的人才具有发言权,在各种不同观点的竞争中,只有“正确的”知识才能最后胜出。在史学领域,知识绝对主义主要是通过关于“历史真相”的信念而体现的。历史学者相信自己工作的意义在于追求历史的真实,往往以历史的代言人自居。但是自 20 世纪初以来,这种信念受到了多次严重的冲击,特别是二战后许多国家的知识界积极卷入政治,以致政治立场干预知识生产,颠覆了史家一直自我标榜的中性和超然的形象。最近几十年后现代主义思潮也冲进史学领域,“去中心化”、“确定性的死亡”以及“虚构”的理念大行其道。今天,即使是一个温和稳重的史家,在谈论“历史的真实”时,也可能会不自觉地退守到“史学的真实”的壁垒中去。在网络时代,参与历史表述的人趋于增加,立场和声音也更加多样化,于是我们就越来越难以断定,哪一种观点是“正确”而唯一的历史表述。

实际上,网络发表对于增益历史知识的贡献,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爱德华·萨义德谈到,“知识,特别是专业知识的增长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知识的增长决不仅仅是个逐渐增加或积累的过程,而是一个在所谓研究成规之内所进行的选择性集聚、移置、滤除、重排和固持的过程。”也就是说,知识增长的实现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空间,需要依靠某些相对固定的载体,并经由某些相对稳定的渠道。网络作为生产和传播知识的空间,具有突

出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而这种流动性和不稳定性恰恰不利于知识的增长。对历史知识总体而言,网络所起的作用主要在于传播,而不是增益。

网络扩大了传播面,提高了传播速度,也加强了历史知识与日常生活的联系。但是,出现于网络世界的历史知识,通常不以创新性为特点。在美国,史学的网络化程度很高,许多史学专业网站在管理、编辑和运行方面,形成了严格的专业规范,文献在发表前也需经过认真的处理,许多有声望的职业史家经常在网上发表论著。不过,这些在网上发表的论著,一般不是原创性的研究成果,而只是纸质印刷论著的前期版本或摘录。我们知道,网络发表的另一个优势是讨论的及时性。可是,网上的讨论通常是议论多于学识。历史知识的突出特点是以事实性信息为主,而脱离材料制约的想法和心得,往往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知识。像 H-net 这样的大型人文社会科学网站,号称在全球 90 个国家拥有 10 万个订户,但它首先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交流信息和讨论问题的平台。中国一些有影响的史学网站,如中国史学网、史学评论网等,也大致不出这一格局。而且,无论是在国内还是美国,目前还很少听说有从网络中产生的原创性历史著作。

在网络空间形成的历史知识多样化的程度也很有限。历史写作不同于文学写作,它在专业化和规范性方面有很高的要求,即便是专业史家要达到这些要求也非易事,对业余爱好者来说当然就更加困难。因此,网络世界的业余历史写作并不活跃。文学创作的情况与此迥然不同。网络文学对于传统文学所造成的冲击,早已成为热门话题。不少观察者指出,在网络世界出现了某种“平权化机制”,网络写手大量介入文学写作,人们对于文学的神圣性和敬畏感受到了消解,专业作家的特权和垄断地位不复存在,文学经典的示范性也遭到了质疑。一个人不论职业和身份,也不论是否受过写作训练,只要有自我表达的欲望,又知道在键盘上敲出文字,就可能成为网络作家。许多首先在网上流行的作品,当显示其商业价值以后,纸质出版机构便出面介入,用“书号”的特许使之获得“合法”传播身份。

可是历史写作必须基于前期的研究,而研究有规范,有技巧,还需要下苦功。收集、占有和解读资料、表述研究结果,都不是能够轻易掌握的技艺,学习起来也很难说是赏心乐事。自古以来,民间可以产生文学,但民间却很少产生史学,而只能产生历史的传说和神话。中国古代所谓“野史”,其实只是非官方版的文人史学。迄今为止,通过网络而崛起的“民间”历史作者,以当年明月最为有名。这个非历史专业出身的年轻人,在业余时间写作以明代历史为题材的通俗读物,创造了点击量的奇迹,在印刷出版后又创造了销售量和版税收入的奇迹。在网络宣传中,当年明月被界定为“历史学者”,称他“将历史还原得深刻清晰,丰满圆润”;他自己也声称“熟练地掌握了历史”,“准确性绝对没有问题”,并反复说自己写的是“正史”。但是,如果要把《明朝那些事儿》当做“正史”,那就必须首先重新定义“历史”,然后重新定义“史学”。

一般来说,历史知识的增长取决于新的事实信息和对事实信息的新解释。也就是说,只有提供新的结论和改写旧的结论,才能增添新的历史知识。当年明月的写作即便如他本人所说属于“正史”,那也没有超出对明史常见资料的文学化和调侃化处理,并未改写明史研究中的具体结论。《明朝那些事儿》之所以在网上受到推崇,并不是因为它改写了明朝的历史,而是它把历史变得“很好玩”。当年明月自承追求情节、悬念和戏剧性,并以各种

机智的调侃和幽默的议论来吸引读者。所以,把“明月”的“升起”看成“网络史学”来临的标志,似乎缺乏足够的事实和学理的依据。有研究者把当年明月的写作纳入“网络文学”的范畴,看来是更有道理。

据有关的研究,“网络文学”所带来的变化,涉及的并不仅仅只是发表形式,而且包括题材、写法、阅读、审美、评论乃至文学的意义等各个方面。当我们在谈论“网络史学”的时候,如果仅仅把它界定为“电子史学”,那就只是一种基于介质和载体的表面区分,似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那么,“网络史学”一旦真正登台亮相,它会给历史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从目前的情况看,网络主要是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方式,却没有在历史观方面造成实质性变化。当年明月虽然在网被尊为“草根讲史的集大成者”,但他的写作与“草根”史观并无任何关系,他讲述的只是“老掉了牙的”帝王将相、权谋野心之类的史事。如果说“网络文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界定为电子时代的“大众文学”或“新民间文学”的话,那么当年明月式的“网络史学”还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草根史学”。

由于网络对历史研究和写作的影响,是否可能出现一个新的业余史家时代呢?诚然,即使在专业化时代,专业史家也从来没有完全垄断历史的表述。非专业的学者写出了许多有影响的历史著作,新闻记者、传记作家、历史影视剧编导等业余历史写手,一直在与历史学者争夺和分享历史的话语权。毫无疑问,在网络时代,能与历史学者竞争并分享话语权的人会大为增加。但是,考虑到历史知识的性质和生产方式的特殊性,专业史家的地位似乎不会轻易受到撼动。如果说现在已经出现了“网络史学”的话,那也只是专业史家从印刷发表空间转入网络发表空间的结果,而不是新业余史家时代到来的标志。

互联网的普及与历史观念的变化

王晴佳 (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江讲座教授)

如果我们想列举一下最近二十年以来所发生的影响人类生活和世界历史的大事,那么毫无疑问互联网的发明和迅速普及,是其中之一。互联网的普及既然已经影响了世界历史,那么它是否也改变了人们的历史观念呢?有关这一问题的探讨,在当今国际学界并不太多。现有的一般论著,比较注意互联网的运用如何有助于历史知识的获取和传授,但并不侧重其在历史观念层面的影响。^①依我管见,互联网的普及同时也造成了历史观念的显著变化。我们或许可以从两个方面对此加以论述。第一个方面与人们的历史观相关,而第二个方面则有关历史的研究和写作形式。当然,这两个方面之间,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截然分开。我下面的讨论,将以西方或者英语世界的变化为主。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电子信息时代的来临,是当今世界走向全球化的一个显著标志。而

^① 2011年美国学者 Roy Rosenzweig 出版了 *Clio Wired: The Future of the Past in the Digital A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的论文集,对当今电子信息时代对历史研究和教学的影响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该书涉及有关历史观念的变化,但大部分的篇章还是有关如何通过互联网和其他电脑设备普及和传递历史知识。

全球化浪潮的风起云涌,相应地促进了历史观的变化。近代以来人们的历史观念,基本都以民族—国家为视角。与此相应,历史写作也以国别史或民族主义史学为重。兰克学派之所以在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能引领一时风骚,不仅因为它强调历史研究的科学化(通过运用档案和考证史料来凸显历史著述的真实可靠),同时也因为兰克本人身体力行,写作了诸多国别史。但有趣的是,民族—国家的建立,并不完全是政治行为,或政治层面上的自上而下的运作,而是与民族共同体及其成员的公民意识的形成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后者的形成,与古腾堡印刷术的运用及其所引发的公共场域(public sphere)的建构有关。换言之,如果说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那么这一共同体的形成,既掺杂了统治者扩疆拓土的政治野心,也结合了这一共同体成员中间所形成的公民意识或者民族主义的意识。而公民意识的形成,借助了民族语言(所谓“国语”)的运用以及用该语言写作的历史、文化的著作(包括一些通俗读物)的普及。古腾堡的印刷术,显然在其中起了一个关键作用,因为它的运用,有助于做到“书同文”,也即“国语”的推行。从这一意义上说,20世纪初的梁启超提倡“新民说”和胡适推行“白话文”,都是为了提升中国人的公民意识,为中国民族国家的建立服务。设想一下,如果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都不识字,各自讲自己的方言,又抱有“天高皇帝远”的心态,那么共同的民族意识,如何通过沟通来形成?在西方文字中,“民族”和“国家”是两个概念:前者指的是“人民”或“民众”(如德语中的“Volk”),后者则代表一种政治权力。而将“民族—国家”(nation-state)并称,就显示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

虽然“民族—国家”并称,却并不表示它们之间没有张力。相反,从国家统治者的角度来讲,印刷术的运用和国语的普及,显然也可为政治服务。而且在民族国家建立以后,统治者一般也正是这样做的。比如由国家出面规划、制订教科书等等,都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如果说印刷术的普及有助于民族—国家在近代的兴起,那么当今互联网的普及,则让人们开始超越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看待历史发展的视角,看到了世界各个地区、各个文化之间的频繁互动和交流。这些交流和互动,借助互联网,常常突破了国家(边境管辖)的限制,甚至根本就不为国境所束缚。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技的进步,还在逐步增加。比如电子邮件的传送,目前的情形是,无论你在世界什么地方,只要那里有互联网,你就可以查阅你在某地、某国注册的账户。现在的3G手机,也同样有这样的功能。你可以在世界各地与人通话。而在经济、商业甚至政治的层面,互联网的普及,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比如当代国际金融市场,可以说是瞬息万变;国家“热钱”的流动,迅猛异常。而一些跨国公司,利用现代社会信息传送的发达和便利,其各个部门根据需要可以分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通过电信技术和互联网加以沟通。比如用Skype打视频电话,开跨国的商业会议,从而避免出境、入境手续的烦琐和省去国际旅行的费用。现在的一些国际学术会议,也同样开始采取视频的技术,让未能亲自赴会的外国、外地学者,也能在会场上发言并参与讨论。^①

① 2011年6月24—26日由华东师范大学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召开的“海外中国学的过去与现状”的国际会议,就运用电脑视频,让远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的中国史专家柯娇艳(Pamela Crossley)发表论文,并参与一场小组讨论。

简而言之,当今的世界已经成了一个文化交流、沟通日益便利的时代。这些交流和沟通,已经不再为民族—国家所限(当然民族—国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仍然时有呈现,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无法忽视)。目前在世界各地兴起的全球史研究,就是希求突破民族—国家史学的一个潮流。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全球史的提倡者杰瑞·本特利(Jerry Bentley)便指出,自兰克学派以来的西方近代史学传统,强调“文化的独特性、认同的排他性、知识的区域性和社会的个别性”,但世界历史的全球化进程和全球史的研究,已经让人走出了这些传统课题的藩篱,看到了区域间的互动、文化的多元、知识的流通、认同的多样等等。^①比如彭慕兰(Kenneth Pomeroy)将江南这个区域与英国国家相比较,就是让人熟知的全球史研究的尝试。其实目前的社会史研究,已经常常突破了国别史的框架,因为诸如家庭结构、两性关系、婚姻状态、犯罪行为等研究,都具有全球的意义,并不为一个国家的经验所限。同样文化思想史的研究,譬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甚至历史学科的专业化,也可以从跨国度的角度来比较研究。我与伊格尔斯和穆赫吉教授合著的《全球史学史》,就主要从区域的视角来考察历史研究模式和学科专业化在世界范围发展的异同。^②

以互联网的普及为核心的信息时代,也改变了历史研究和著述的形式。西方史学的基本模式,以叙述体为传统。^③这一传统创自希腊、罗马时代,到了中世纪为编年体有所取代。但即使在中世纪,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传记史学,仍然十分重要。文艺复兴以来,叙述体重振旗鼓,再度成为了西方史学写作的主要体裁。民族—国家史学的兴盛,更突出了叙述体在历史写作中的中心位置。一般国别史的写作,都力图追溯该国家历史的渊源,并将这个国家的历史演变,由远及近,用叙述的方式娓娓道来。同时,由于强调科学的客观主义,史家在运用这一叙述体裁的时候,不但希望所用的史料准确无误,而且在叙述的时候也希望做到不偏不倚、立场客观。因此他们都使用第三人称,让作者置身于叙述之外,力求让读者直接与他们所叙述的史实相接触。兰克那一代的史家,强调运用第一手的、原始的史料来编织、叙述历史,便是这个道理。

但是信息时代的降临,削弱了叙述这一手段在现实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因为信息爆炸,随手可得,人们的阅读习惯随之改变。史家阅读史书和研究史料,也相应地受到了影响。当今已经很少有人会有像以前那样的闲情逸致,拿出一本史书来,从头至尾地阅读一遍,欣赏其叙述的委婉动人和辗转曲折。相反,由于知识的生产过剩,加上历史学科的专业化,历史研究者必须迅速了解和掌握同业者的研究成果,以求在研究中与之有所交接,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创新的可能。因此在阅读史学论著的时候,就需要尽快地知道作者的论点,而对于历史著述的叙述部分,则往往加以省略。现在有愈来愈多的专业刊物,在每篇论文前面都加上了摘要和关键词,其目的显然不是让读者细嚼慢咽,仔细琢磨作者的论证,而是想加快阅读的速度,让读者能迅速掌握作者提出的观点。而关键词的设置,更是希望读者

① Jerry H. Bentley, "Globalizing History and Historicizing Globalization," *Globalizations* 1:1 (2009) p. 79.

②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著(穆赫吉参著),《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到当代》,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③ 此间有不少人喜欢用“叙事体”来概括西方史学的体裁,但我以为“叙事”一词比较狭隘,而西方史学的叙述包罗万象,并不能由“叙述事件”所涵括。事实上,人物传记的写作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

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浏览相关的研究成果,获得对这一领域现有成果的粗略了解。

上述变化,亦可以称为一种史学上“叙述的转折”。这一转折的意义就是,原来阅读史书,是希望通过叙述来达到对所叙述的史实的一种认识,但现在阅读史书,则往往是由一种叙述转移到了另一种叙述,因为阅读的重点是在了解那个作者对某段史实的叙述,并与之切磋、交流和互动,而不是在掌握、理解那个叙述背后的历史事实。用荷兰历史思想家安可斯密特的话来形容,历史研究已经成了一种“平面的移动”(从一种叙述到另一种叙述),而不是“纵向的深入”(透过叙述来展露历史事实)。^①

这一“叙述的转折”,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突出了叙述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其实不然。近代史家原来运用的叙述体裁,无论多么委婉曲折,其实大都想呈现一种历史的因果关系,也即关注历史运行背后或之上的层面。这一层面,可以是“元叙述”(metanarrative),抑或是“宏大叙述”(grand narrative)。而现在从一种叙述到另一种叙述的平面移动,则基本忽视了历史叙述中的因果关系。史家更为重视的是作者的“立场”或“位置”(position),也就是作者的主观解释以及为了阐述这一解释所运用的叙述方式。虽然从职业训练而言,评价一部史书的质量,还多少取决于该部史书是否能准确地展现历史事实,但事实的情形却是,一般的历史从业者并没有太多时间去核对史料和叙述的准确,而更多地注意作者是否能开宗明义,迅速阐明自己的立场与观点,并展现其观察角度的独特和新颖。中国的成语“语不惊人誓不休”,似乎是对此情形比较贴切的形容。显然,当今史家如何在信息爆炸、知识过剩的时代达到一语惊人,除了要对历史知识有深入的掌握,还必须掌握表述这一知识的最有力的表现方式。总之,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不但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态度,同时也在改变历史研究和著述的模式。以上只是我的一点粗浅观察,望方家批评指正。

互联网资料的史料价值

王加丰(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二战爆发之初欧洲大陆的“奇怪战争”期间,法国年鉴派创始人马克·布洛赫在军营中写道“保尔·瓦莱里曾举例说明‘电征服了地球,它对人类历史的意义和未来的潜在影响远远大于所有政治事件的总和。’尽管如此,历史学却对这类值得注意的现象熟视无睹。对他的看法,我们表示由衷的赞赏。令人遗憾的是,迄今尚无人重视这个庞大的课题。”^②面对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及其多方面作用的迅速增加和变化,今天的历史学家也有必要像布洛赫那样关注和分析这一现象,因为它不仅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也在改变我们对史料和历史事实的见解。

所谓互联网资料,泛指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中存在的所有资料——文字、图片或视频的,等等,又可称“网上资料”、“网络资源”或“XX数据库”等。此类资料大体可分为三类:

① F. R. Ankersmit, "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 *History and Theory* 28: 2 (1989) p. 146.

②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张和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1. 有相应的实物形态存在的,而且这些实物一般而言会得到长期保存。如报刊杂志、书籍、文物及各种天然的和人工的制品(山水图画、建筑物等)。对此类资料来说,互联网的作用主要是一种保存功能:图书馆里的一些书籍经过数字化处理,以各种数据库的方式加以保存。2. 一些产生时以实物形态存在,但很少有人专门加以保存,上网后却可能长期留存下来的资料。它们包括:某些个人的照片、笔记、作业;一些广告牌、海报、节庆装饰的文字或图片;按照各种档案保管规定被视为不重要或无保存价值的文字或实物图片。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每天都在生产大量的文字图表文档,但根据各自的规定,有的长期保存,有的只保存一定的年份或时间,有的则不属保存之列。当然它们在互联网中的“寿命”部分地也取决于有关网站主管人员对它们的认识,因为一些企事业单位或政府部门会经常增删自己网站上的材料。3. 只以各种电子文档形式存在的资料。这种资料中最常见的是各种评论或说明、关于各种事件的描述、形形色色的博客(没有正式发表过的,包括文字和图片)。

后面两类可看成是严格意义上的互联网资料,某种意义上它们是独一无二的史料。当然,总体上看,网上资料不是历史资料的全部,某种意义上也不是最重要的历史资料(这里不包括各种资料性的数据库),但其作为史料的价值是不可否定的,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1. 在一定情况下,它比任何其他形式都能更真实地反映下层民众的期望与追求、心态及表达方式和特点。人民网上有一篇文章讲的就是这种情况“目前的一些社会心态状况并不令人乐观……因经济多年持续快速发展而不思进取的心态有之,因看不到成功与进步的可能而放弃进取的心态亦有之;一些富起来的群体、一些有权势的群体骄横狂妄、肆无忌惮的心态有之,一些弱势群体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铤而走险的心态亦有之。网络上,经常能见到如针对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一些尖锐言论,非理性情绪的滋生及蔓延应该引起足够警惕。”^①这种概括既产生于对现实的观察,又产生于对网络资料的感受。自从互联网出现以来,它越来越成为了解社会最底层心声的最佳途径或最佳途径之一。这里讲的最底层主要是指在社会中最没有机会发出自己声音的那部分人。从“网络问政”的角度看,政府有关部门关注网络舆论,相当于我国古代政府的“采风”,只不过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比采风更加快捷和便利。2. 有可能更深刻地让人了解一些精英人士的内心世界,同时也能更详细地了解他们的经历和心路历程。这是因为精英人士喜欢在网上更自由或更随便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一些精英人物之所以喜欢在网络上发表意见,是因为他们认为有些意见通过我们平常所理解的正式媒体来发表并不合适。今年7月初,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他的官方网站上声称许多孟加拉国人是“非常反印的”,但很快被删除,总理办公室的解释是该言论是“非正式的”。^②这件事告诉我们至少这位总理有过这种想法,而这种想法是通过互联网来披露的。湖南某市有个姓姜的副市长,2004年因为在网上发表自己对发展当地旅游业的高见受到领导重视进入官场,2010年又在网上发帖炮轰高房价而被调离副

① “‘骂国’反映群体性怨恨不公平心态致非理性滋生”,<http://www.people.com.cn/h/2011/0627/c25408-228312073.html>。

② 《印总理称许多孟加拉国人“非常反印”引争议》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7/03/c_121615709.htm。

市长职位。^① 这位副市长的经历与互联网紧密相关,互联网不仅改变他的命运,也使他的心路历程显得异常丰富。3. 网络资料几乎能为所有的重要事实增添史料,丰富我们对各种史实的认识。网上参差不一的文字,包括社会上褒贬不一的“人肉探索”,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真实的资料,使我们在档案公开前就能知道许多有关的事实,而且有的材料根本不会出现在档案里。不久前钱江三桥的引桥坍塌,新华网有一篇文章就此提出“类似的‘浙江省政府车队从来不走钱江三桥’、‘发改委把钱江三桥列入危桥’等‘预言帖’早已在网上出没。”而且早在2007年,天涯论坛上就有人署名“天籁慧音”发帖强调钱江三桥“安全隐患多”。^② 我想,“政府车队从来不走钱江三桥”之类的事实是不太可能出现在档案里的,只有互联网才有可能用文字的形式把它记录下来。

最后,我想谈谈互联网资料的辨伪问题。网络是一种新型的媒体,在资料真伪的问题上,它有与其他史料相同的特点,也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它的复杂性主要与它发表时受到的审核比其他媒体更简单有关,也与作者良莠不齐有关。但不能说网络上的资料都不可信,实际上有时最真实的消息就出现在网络上。

传统的史料识别方法对网络资料同样是适用的,包括孤证不成立、双重或多重证据互证等。网上资料可以与其他形式的史料互证。在这里,网上资料作为一种资料来源,其有效性是与其他形式的资料一样的,关键是要经过互证。当然网上资料不能简单化地应用“孤证不成立”的标准,因为互联网的性质是一批人可同时或先后在不同的地方或在同一个地方通过不同的电脑制造同一种假事实。这种情况以往在纸质媒体上也发生过,但网络为这种造假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

网上资料还有一个特点是它随时可以修改,一些组织或个人的资料会随着时代或年龄的变化不断被修正或被删削,这时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自己所看到的网上资料的产生时间。由于不断修改的一个后果是你无法搞清楚它的“各版”的真面目,所以将来可能会以语言学的方法(不同时代使用不同的语言,一些网络语言迅速出现又迅速“消失”)等多种手段来辨别网上资料的真伪。还有一种类似的情况是你下载的一则资料一段时间后可能被有关网站或博主删除,你若在历史研究中使用这则资料就有造假之嫌,这时最要紧的是要找到相关的资料,网上的或非网上的,来证明你下载的资料的真实性。

多采用“权威”网站的材料,或用它们的材料来互相印证,或许是使用网上材料必须遵循的一条规则。我国的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等,其材料的可信度应该超过一般的网站。2010年11月新浪网启动微博辟谣工作,“针对微博中恶意、有害的不实信息及时进行调查和辟谣。”其采用的手段主要有不间断监控、主动监控和网友举报相结合、多方位进行信息核实、虚假信息查证后尽快给以处理等。^③ 相信这种做法会越来越完善,而且或有越来越多的网站或个人开展这项工作。由此看来,网络虽然是一种崭新的现象,但人类的行为总是

① 曾向荣《炮轰高房价副市长被调任高校:希望大家不要仇官》,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0-08/17/c_12452233.htm。

② 章蓐、方列《网民4年前预言杭州钱江三桥存隐患称政府车队从来不走》,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1-07/17/c_121676955.htm。

③ 谭超《“微博辟谣”与谣言赛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7月14日第7版。

有延续性的,对网络资料的真实性问题,只要在传统方法的基础上再根据网络的特点加上一些新的技巧,是可以判断的。网络也是一把双刃剑,它便于造谣,也有利于辟谣。大的谣言很容易迅速受到质疑。今年6月23日傍晚北京遭遇了强暴雨天气,有网友将北京积水的照片汇集发布,称之为“新燕京七景”,但很快就有人指出其中三张“海景图”是伪造的。^①

总之,网络资料在补充实物形态的史料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在某些史学领域,如社会史、政治文化史中,它正成为最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它们特别有助于政治文化史或社会思潮或人物、团体的研究。随着网络影响力的迅速扩大,一些本来由传统媒体来做的事情正越来越多地转向互联网,也就是说互联网资料作为史料的重要性将不断增加。比如,名人是有机会充分利用传统媒体的,但越来越多的精英喜欢通过互联网来发表自己见解,这与互联网的特点有关。现在,越来越多的文人打口水仗不再通过报纸杂志而是通过互联网,因为这样更加方便、快捷,说话也更加随便。今年7月中,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一位教授在上海一家报纸上发表文章批评本届“中国达人秀”的评委周立波思想肤浅、教养低下,周立波却在博客上回击说“像你这品种的教授,江河湖海沟到处都有!但周立波再烂也就一个。”^②这种话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中国当代部分精英的心态。学术打假也是这样,去年通过网络揭发中国“打工皇帝”学历造假事件即为这方面著名的例子。^③这种趋势还会进一步发展,如果我们对这种现象视而不见,那么越来越多的宝贵史料将会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或者说,如果我们不认识互联网资料的史料价值,我们的历史著作将是不完美的。

“自媒体时代”的历史研究和史学表达

马 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人类具有超常的历史记忆能力,也总是追随最先进的记忆工具去表达自己走过的路。中国文明的发生其实就是历史记忆的萌生,不论是史前的刻画符号,还是殷墟的龟甲,后来的竹简,再后来的造纸,每一次技术上的进步都使中国的历史研究和史学表达发生一次深刻变化。没有龟甲,没有竹简,就没有孔子删订六经;没有造纸,也就不可能有历代正史的编修与流传。

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的历史研究和史学表达又发生了一次重要变化,专业性的学术刊物及报纸上的史学专栏,成为过去一百多年中国史学表达的一个重要形式。我们过去说某个历史学家有学问有成就,其实也就是暗指这位历史学家在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少具有创见的学术文章。

自从互联网发明并传入中国之后,中国的历史研究和史学表达在不经意间又发生一次

① 刘琳《北京暴雨“新燕京七景”图发布三照片被指造假》,原载《北京晚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7/09/c_121644890.htm。

② 李不准《周立波与同济教授掐起来了》,http://www.people.com.cn/h/2011/0714/c25408-3093550915.html。

③ 肖欢欢、武威《唐骏高调复出称学历未造假,方舟子斥其“无赖”》,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tangjun/content-2/detail_2010_12/13/3470646_0.shtml。

深刻革命,这一次的史学革命对先前一百多年所建构的历史研究模式有根本性颠覆。在过去一百年,历史研究是一个逐渐专业化、圈子化的过程,历史研究越来越与社会实践、社会期待与社会大众的关切不相关,成为历史学专业人士的自娱自乐,许多专业性的历史学刊物,其实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比纯文学的刊物还要惨淡,不说经济上的补贴和亏损,只说其读者越来越少,也不能不让人思考这样的深度研究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是社会不需要,还是一般民众太缺少知识,无法引起共鸣,无法回应?这里面其实有着很大的检讨空间,假如历史学者愿意且能够直面真实的话。

其实,历史研究从来都是社会进步最需要的,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每一点进步或变化,都会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回望过去,比照过去,专业的历史研究无法回应社会急切需求,无法应对迅即出现的许多新问题,这就为另外一种即被称为“草根史学”的非专业研究所替代,由此我们看到与过去一百年历史研究日趋专业化相背离的一个现象,即专业的研究越来越显得非常“不专业”,专业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总是使人觉得是在为体制为职称而奋斗,从选题到论证,大多数都与社会需求社会感觉越来越远,称为高头讲章,结果也就被束之高阁,如若不信,只要统计一下各专业刊物发行量,就知道真实情形了。

与专业的历史研究相反,“草根史学”在过去若干年呈现出越来越专业化的倾向,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些“草根”没有名气没有体制没有职称等方面的束缚或企求,因而在选题上注意切合社会需求,注意真正的研究空白,注意大众阅读,期待尽可能多的读者。因对他们来说,无人喝彩就是失败,拥有粉丝拥有读者才是成功。

“草根史学”的发生与繁荣当然是因为史学表达手段的更新,具体的说就是互联网的普及和利用,特别是网络论坛和微博这种“自媒体”的出现,人人成为历史的创造者并没有能实现,但人人成为历史的记录者、研究者却有了现实可能性。如果我们这些深居研究院和大学校园的研究者不能正视这个现象,可以相信在不太远的将来,史学表达的话语权必将发生位移,草根史学家越来越多的话语表达必将逐渐颠覆我们的正统史学观念,重构一个新的历史解释体系。所以,专业史学工作者不仅要重视草根史学的研究成果,而且应该深度介入草根史学的工作平台,和他们一样在同一个平等的工作平台上对话,这样不仅有利于引导草根史学走向理性,而且有助于及时纠正草根史学的先天缺陷和知识性错误。

在“自媒体时代”,草根史学的工作平台就是互联网上的各种论坛,在国内当前最活跃的是微博,微博中的许多“达人”动辄拥有数万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粉丝,而这些达人要想维系住这些粉丝,也必须不断充填新的内容。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往往成为他们的首选,因为近代史的话题对大多数微博使用者来说,多少都会知道一点,这是吸引他们的关键。

抽象地表述很难理解微博在讨论传播近代史话题的意义,他们的这些表述在许多时候都是因为现实中的某些事情引起的联想,或者是“历史上的今天”。以今天(2011年7月31日星期日)微博上历史话题的热点为例,今天是近代史上著名记者沈荃遇难日。沈荃这个名字在近代史专业之外大约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但一位远在日本的侨报总编辑却在一大早发了一条微博:

1903年7月31日,沈荃为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献出生命。当年年初,天津《新

闻西报》披露了沈荃搜集到的有关《中俄密约》的内容。国人因此怒斥清廷卖国。清政府遂将沈荃逮捕入狱,慈禧下旨将沈荃杖毙。于是,刑部的官吏用竹鞭捶击沈荃,酷刑连续四小时后,最后竟然被用绳索勒死,时年31岁。

这个微博介绍了沈荃的事迹和结局,但依然显得比较平淡,并没有多少深度和现实关切,紧接着一条稍具深度的微博写道:

沈荃的故事在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他既像突尼斯的小贩,又像几年前的孙志刚。沈荃之死引发的第一个后果是公共租界不再同意引渡《苏报》案要犯章炳麟、邹容,担心清廷将他们处死;第二个是迫使清廷修律。这就是沈家本、伍廷芳的法律改革,稍后不仅迫使清廷废除了酷刑,而且逐步走到司法独立。

这个微博根据史事极大丰富了沈荃故事的表达,而且关涉晚清司法改革、新政评价、革命党人的活动,因而迅速引起关注,特别是经过一位拥有上百万粉丝的微博达人转发,不到两个小时就被转发五百次,评论近百条。至于阅读过而不评论不转发的,那就无法计算了。所以在微博上有人说:

你的粉丝超过了一百,你就是一本内刊;超过一千,你就是一个布告栏;超过一万,你就是一本杂志;超过十万,你就是一份都市报;超过一百万,你就是一份全国性报纸;超过一千万,你就是电视台。

这个说法虽然稍嫌夸张,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形象说明了微博这种自媒体的工具意义。今日历史学家不去充分利用这种自媒体进行表达,当然还不会被淘汰,但其影响力特别是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力显然会明显降低。

微博这类自媒体当然有助于知识传布,同时也像许多批评者所说,在这类自媒体上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有位拥有上百万粉丝的微博达人为历史学出身,但多年经商,使他除了保留对历史学特别是近代史的酷爱外,知识的更新又确实很少,他在微博上完全出于热心喜欢大量转发,同时也自创一些历史类的微博,只是由于时间太忙,知识无法及时更新,谬误或失误之处当然不少。比如一条谈李鸿章的微博说:

1888年7月23日,李鸿章在两广总督衙门点着广州第一眼电灯,1890年后的皇宫西苑以及颐和园开始电灯照明,开广州、北京电灯使用的先河。由李鸿章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等。

这条微博充满了对李鸿章的尊敬,也是希望纠正社会公众对李鸿章的偏见。由于博主具有巨大号召力,这条微博在发出不久就有近千次转发,百余条评论,而他的粉丝超过一百

万,被动阅读或者阅读后不评论不转发的至少应该有1/3。几乎所有评论者都追随博主,从一种同情理解的立场颂扬李鸿章对近代中国的贡献,这当然有助于知识的传播。不过,从专业立场看,这个微博中的失误或知识性错误太多了,如果没有专业知识人的介入纠正,这些不尽正确的历史知识必将继续流传,以讹传讹。好在微博具有很强的对冲机制,微博上也有一些近代史专业人士,虽然这些专业人士碍于面子不愿直接批评或纠正,还是非常客气的发出一些善意提醒,希望博主查证一下李鸿章的履历,将不正确的地方纠正过来。

自媒体为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平台,在那里没有专家审稿,没有编辑把关,对于历史,特别是对于自己民族的历史,每一个人都有自由表达的权利。这是好事。运用得当,有助于民族素质的提升,有助于历史学的普及,历史知识的受众必将在这种方式的影响下大幅度提升。所以历史专业人士一定不要轻视这个领域,要放下身段,从那里不仅能够开辟一个新天地,而且能够享受历史学本有的乐趣。

信息化的历史学:基于互联网驱动的史学变革

王旭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信息研究系主任博格曼(Christine L. Borgman)在2002年出版的一本专著前言里提到,互联网是自600年前古腾堡(Gutenberg)发明印刷术以来人类交流史上最伟大的进步。^①该书问世后仅几年时间,便令站在2011年这个时空坐标点上的我们完全能够断言,其历史意义之伟大将远非局限于此。回顾世界历史,仅就科技层面而言,影响社会的发展进而引发全球性深远变革的事件,近代以来至多不过两三次。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是18世纪中叶的蒸汽机的发明,它驱动了世界范围的工业化进程,把人类带入现代的工业社会;另一个便是20世纪下半叶的互联网的发明,它驱动了全球的当代信息化进程,将人类推向21世纪伊始的信息社会。这里值得指明的是,蒸汽机问世后的应用历时200年左右,才在20世纪中叶成就了世界上为数不多、发达的现代工业化国家。而出自军事用途问世的互联网,自打20世纪80年代初转向民用以来,却仅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便让整个世界为之全面改观。

今天的人们,无论何种国籍或置身地球何处,无论何种职业或上至领袖下到平民,无论何种性别和年龄,只要自己愿意且客观条件具备,均可利用身边的台式/笔记本电脑或iPad;掌中的智能手机或iPhone;客厅/卧室的平板互联网电视或TV机顶盒……随时随地的登上互联网,在国际网络的电子虚拟空间里,任意浏览/收看远近新闻,针对性“Google”(搜索/获取)各类图文声视资讯,信手“微博”个性化主张或直接“博客”出版作品;系统地从事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网络军事、远程医疗、网络科研教育,乃至网络化地操持起日常生活(吃穿住行用恋婚等等)。所有这些现今让人熟睹的表象背后,则是一系列未曾有过的深层次的变化,如:1. 自然人凭借对互联网应用的掌握,让手的功能得以“延展”和脑力极

^① 克里斯廷·L. 博格曼《从古腾堡到全球信息基础设施》,肖永英译,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IX页。

大“拓扩”,实现了个体的人所具有的创造潜能的全面激发。2. 在互联网构建的扁平式虚拟社会空间的冲击下,现实当中历经千百年形成的传统的叠加式社会结构和金字塔式社会组织形式,由于网络信息传递的即时性、直达性、互动性和共享程度日趋极大化而开始由垂直向扁平转化。以上两点进而导致。3.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曾在1982年出版的《大趋势》一书中,依据发生的新技术“缩短了发讯者和接收者之间的距离,加快了信息流动的速度”的“通讯革命”,发出正在或已经呈现“瞬息间即可共享信息”的端倪预测和代议民主制将在不远的未来转向“共同参与民主制”。^①自2009年“推特”(Twitter,微博的创始先驱)因伊朗大选事件受世人瞩目以来的短短两年多时间,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微博这样一种篇幅局限于140个字词的微型网络信息即时发表/传递工具,正在通过民众凭此直接、广泛地参与政府决策并监督其职能等诸多实践,^②而把奈斯比特的预测变成现实。当然,亦如我在2007年的一篇论文里论及的,以计算机互联网络为基础的当今社会信息化,不仅是在政治上,而且更是在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等领域,全方位地影响并已经触及根本地改造着我们的世界。^③因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做赘述了。总之据此不难结论,互联网之对于社会的加速发展所具有的巨大驱动作用,应当更为空前。而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21世纪头10年的当代世界史或一些国家的历史,无视或忽略互联网及其所代表的社会信息化进程,将会是难以想象的疏漏。

已经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互联网,在不断改变世界的同时还会持续地作用于人们未来的自身发展。如此,当然也会不可避免地改变着我们史学工作者以及所从事的史学研究。这是由于,互联网及其所代表的当代社会信息化,不仅已经成为历史学的关注和研究对象,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其从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论乃至历史哲学等层面,对整个历史科学造成了有可能引发深刻变革的冲击。

就方法论而言,以计算机取代传统的书写工具,利用搜索引擎在互联网上获得相应的研究资源,这对21世纪今天大多数的史学家来说,都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了。但在此依然需要强调,精通掌握并善于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这两点却是构成了以下讨论的基础,而且更是触发我们去形成历史科学的信息化思维、实现研究方法上不断自我履新的工具前提或重要手段。我们知道,史学领域的所有文章,均不外作于历史研究的主客体之间。历史研究的客体,有着真实实在和文本的区分。前者是后者的本源,而后者则是前者留于后世的存在或表现形式。前者虽因时间的不可逆性而无法直接企及,却完全能够借助后者让人们尽量地去靠近它。如此,历史科学便对史学家提出了三个具有逻辑关联的基本要求,其一为最大化地占有史料或资料;其二为合理地诠释这些史料或资料;其三则是在前两点的基础上,通过文本的真实,科学地重构出历史的实在“真实”。

最大化地占有史料或资料,不仅计算机数据库和互联网的问世之前后不可同日而语,

① 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梅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2、161、162页。

② “中国微博热令世界惊讶”,《环球时报》2011年6月24日,环球网<http://opinion.huanqiu.com/roll/2011-06/1779112.html> [2011-08-06]。

③ 王旭东“论社会信息化的影响与冲击——从当代历史进程到世界史研究”,《世界历史》2007年第5期。

甚至于智能检索和云计算(Cloud computing)技术的应用之前后,也一样地不可同日而语。20世纪90年代以前,史学家个人毕其终身以手工辛勤誊写文献卡片,所积攒到的研究资料比之现存于世的史料文献,不过沧海一粟。90年代中期起,一些大型信息资源网站和数据库开始陆续建立,具有代表性的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美国记忆”(American Memory)项目、加利福尼亚数字图书馆、JStor 过刊数据库、Lexis/Nexis 文献数据库、Questia 在线图书馆……此后,只要我们能够通过互联网访问到这些数据库,就如同拥有了其所提供的海量资源,但能否有效利用,还是个令人挠头的问题。因为信息爆炸使得很多按传统习惯思维和行事的人,无法从海量数据库中便捷准确地找出自己想要的东西。不过如此的进步毕竟已然成了一种质的飞跃,国内外一些善于掌握数据库访问和检索技术的史学家,开始从中获益。历史学科的很多门类,不论是研究领域还是选题,也因之开始有了较大突破。到了21世纪的头10年里,由于以Google为代表的互联网智能搜索引擎的成熟和以Oracle为代表的大型数据库平台系统检索技术的智能化,亦同时,基于互联网访问的数字图书馆(提供古籍档案等史料文献)的涌现,史学家只要娴熟掌握相应的信息化技术手段,便可将最大化获取和占有研究文本(史籍典藏、档案文献、考古影像视频、历史图片、口述史录音、记录影片等)的梦想变为现实。Google的出现及其技术和数据库在21世纪初的发展具有革命性意义。据统计,其在1998年开始运行时只能对2600万个网页进行搜索;2000年网页搜索量升到10亿个;2008年年中,可以搜索到的网页数则多达1万亿个。^①而所有这些,Google均以“网页快照”技术即时抓取并存储到专用服务器上,日积月累地聚集成了局外人难窥其数的网络数据库体系。记得2002年,我曾在中国社科院的一次信息化立项汇报演示会上提出,开发利用网络互联技术,为世界史研究构建一个能通过远程调用来便捷获取/汇集散布世界各地的信息资源,将全球纳入数据库结构设计的设想。当时便有中国科学院评审专家建议可用“网抓”技术来实现。8年后的今天,对于每一位史学家尤其是从事世界史研究的人来说,善于驾驭采用上百万台高速服务器支撑的云计算从而愈加强大的Google,就等于拥有了这样的“个人”全球数据库。而且,Google的定制功能,还做到了让搜索引擎自动地抓取预设信息并将之呈现在注册用户的页面上。

合理地诠释史料或资料,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便是对其进行处理和解析。事实上有了Google系统,不仅可以做到足不出户地“Google一下”便到达互联网所及的世界任一角落,同时还能够根据我们的研究目的和需求,调用Google提供的相关功能模块或工具,直接在互联网上即时实现对资料的初步处理。比如:1.使用多语种在线互译功能模块,浏览/筛选小语种文本,发挥各种语言之文献资料的作用;2.使用趋势分析功能模块,历时性地把握某个史学问题的国际关注或研究的动向;3.使用空间分析功能模块,共时性地了解某一史籍文献或史学专著内容所涉地理方位(国别/地区/地点等)的分布状况;4.使用Google Maps和Google Earth工具,将我们的史料或其他研究资料叠加到地图乃至全球地貌的卫星影像上,从而不仅实现对不同时空的历史要素之相互关系的分析,而且还可实现对人类社会同生态环境之互动关系的分析。当然,绝非仅有Google才具备这些可供史学研究使用的信息

^① Jeff Jarvis, *What Would Google Do?* Harper Collins 2009 p. 5.

处理功能。我们的个人计算机/笔记本电脑安装的 Excel 就能开展较好的时间序列趋势分析和初步的空间分布分析。倘若安装上专业分析软件,时间序列分析如使用统计软件 SPSS 或 SAS,空间分布分析如使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 ArcGIS 或 MapInfo 等,对史学研究资料的有关解析将能得到专业性更强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研究资料的计算机量化分析,海外学术界早在 20 世纪晚期就已运用到人口史、经济史、社会史、环境史和考古学等领域;而今,这些手段或方法已被移植到了互联网上,并正逐渐向历史学的其他领域推进。如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基于互联网开发的地理信息系统史学空间分析应用平台——“中华文明之时空基础架构”(CCTS),便是其中较为成功的典范。该系统在中国逾 2000 年的历史地图之上,叠加整合了汉籍电子文献系统、清代粮价资料库、明清地方志联合目录资料库等一批研究资料,并提供了在线分析手段。^①对于史学家个人而言,整合各类研究资料的处理和解析成果,据此科学重构历史的“真实”之目的,同样可以凭借互联网通过“数字地球”(Digital Earth)技术的应用加以达到。用数字地球技术展开跨时空的比较分析,更有助于探索和揭示不同历史因素、不同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

以互联网为标志的当代社会信息化进程呈现的新现象,以及给史学方法论带来的种种改变,势必触发我们对史学理论中的某些历史认识论或历史哲学范畴的命题重新做出思考。比如,最为基本的一个命题“历史到底是什么?”倘若对此探寻的思绪不仅是由史学层面提升到元史学,而是上到更高的本原层面去追究,那么,我们不难发现并或许可以回答为“历史就是信息。”信息时代里,具有如此的认识很重要,因为有助于史学家形成历史研究的信息化思维,从而更好面对基于互联网驱动的史学新变革。

互联网与社会平等

刘 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互联网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巨大和无孔不入的,它像一张魔网,囊括了一切,改变着一切。有了互联网,人们可以在家里上学、看报、逛商店、开公司、炒股票、访亲交友,等等。若想全方位地描述互联网的社会影响,写几本书也许都不够。本文只想概括其一个基本特征即“非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②对人们政治和历史观念的影响。冷战时期,美国研发互联网的初衷就是使其军事指挥“非中心化”,即在外来攻击摧毁其指挥中心时,美军在各地的部署不至于全部瘫痪。最初美国在本土东西海岸各设立了两个指挥部,这四个点之间的联系构成了美军最早的指挥网络系统。

科技发明的社会作用远非发明家所能控制和想象的。互联网的“非中心化”渗透到了

① <http://cts.asc.cn/index.php?lang=zh-tw> [2011-08-08].

② Max Kaase,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Interne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21, No. 3, 2000, p. 269.

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加速了社会平等或民主化趋势。国外学界对此已经有很多研究^①认为互联网有利于民主参与的原因大致有:互联网降低了政治参与的门槛或成本;形成了公众论坛,便于政治交流;增加了投票参与;不容易被政府控制;与政府部门和官员的联系更密切,等等。这里的社会平等或民主化趋势指民众对有关他们生活的事情有更多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包括罗伯特·达尔在内的一批美国学者认为,以互联网为标志的电子民主(teledemocracy)将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可以与18世纪西方国家以代议民主取代直接民主相比。^②以洛克、孟德斯鸠和麦迪逊思想为代表的西方代议民主制,是近两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最伟大的社会进步之一,但其也有很多问题,尤其是选民“被代表”和近几十年来民众政治参与程度的持续下降的问题。

一般认为,直接民主制只适合于小国寡民,不适合近代以来形成的庞大的政治共同体,然而,代议民主在弥补了这一缺陷后,始终被如何防止民选代表脱离民意,选举时期有民主,选举后选民“被代表”的现象所困扰。西方民主理论不是铁板一块或一个模式,自近代以来,直接民主或民众参与理论与代议民主或精英民主理论的争论至今未息。很多国家至今还保留着全民公决这一直接民主形式,作为对代议制民主的补充。如何让代议民主更接近直接民主之实,互联网为代表的电子民主,在理论上和技术上提供了一种选择和希望。

近年来,美国网民每年以50%—75%的速度增长,这与上世纪20—30年代拥有收音机和50—60年代收看电视的人的增加速度相当。^③人们还记得,罗斯福总统通过广播进行的“炉边谈话”曾如何鼓舞了大萧条中的美国人;而50—60年代世界各地电视中出现的美国军警用警犬和高压水龙镇压黑人学生的场面,如何使美国政府蒙羞,乃至一些史书中总结黑人民权运动胜利的原因时都要提到电视的作用。网民也称数字公民(digital citizens)的大量涌现不仅使一些学者重新燃起了对民主的希望,而且还产生了用电子化的直接民主弥补代议制民主弊端的强烈愿望。^④

互联网的“非中心化”也可以理解为多元化或平民化。社会和政治生活都离不开人与人的交流,可以设想,在没有麦克风和扩音器的时代,人们靠噪音交流的范围能有多大?以往的媒体:书籍、报纸、广播、电视,基本是少数精英对多数民众的单向传播,互联网则提供了多数人对多数人双向交流的平台。互联网在平等地对待所有人的同时,即网络交流没有国别、性别、种族、肤色、年龄、职业、地位等限制,对弱势群体更为有利。尽管有不少关于互联网拉大了社会差距的观点,因为毕竟上网也是有成本的,对网络资源的获取和利用也是

① 打开西文期刊储存库(JSTOR),输入“互联网与民主”,会出现10123篇文章;用“互联网与政治学”可以搜索出19074篇;在“互联网与史学”下有31107篇。

② Bruce Bimber, “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Populism, Community and Accelerated Pluralism” *Polity*, Vol. 31, No. 1 (Fall 1998) p. 134.

③ Bruce Bimber, “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Populism, Community and Accelerated Pluralism” *Polity*, Vol. 31, No. 1 (Fall 1998) p. 134.

④ Dick Morris, “Direct Democracy and the Internet”, see <http://www.yoyang114.com/data/2009/10/16/2009101695232amargimj0.pdf>.

因人而异的,精英群体往往能更好地利用网络扩大其已有的优势。^①但我仍然认为,互联网史无前例地为平民和弱势群体的自我表达和社会参与提供了机会。以往的历史之所以是帝王将相或精英人物的历史,因为平民百姓没有留下自己文字声音的机会,能著书立说或被载入史册的毕竟是极少数人。现在互联网上处处留下了普通人生活的印记,百姓可以开博客主持沙龙,也可以跟帖议论社会热点问题,微博更像是一种个人媒体,随时对外发布新闻消息。甚至可以为已故的普通人在网上建纪念馆,生平事迹、音容笑貌都可以放在那里,供后人长期缅怀瞻仰。这些事十几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

前不久,两位印度“海归”不堪其国内腐败横行,创办了一个“我行贿了”网站,让人们上网公布自己行贿经历,实际是揭发受贿者,曝光社会腐败现象。该网站迅速走红,一些受贿者因此受到了惩罚。

我们常说,民众创造了历史,人民是国家主人,但这些理想目标往往需要借助一些具体途径或方法才能实现。如毛主席所言“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②先进的社会制度为民众的社会参与提供了可能,但如何了解民意,让民众充分有效地参与社会决策,仍是一个有待改善的问题。中共“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互联网则是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途径之一。

从理论上讲,电子民主可以扩大民众社会参与程度,促进和改善目前的代议民主制;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中尤其是短期内它就会如此、必然如此;也不意味着它要取代目前的民主形式。实际上,有多少理由说互联网有利于民主,就有多少理由反驳它。^③例如,网民增加并不必然会提高社会参与率,上网的人并不一定都关心时政要闻,关心时政的也不必然去亲自参与。

回顾历史,哪一次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没有反对和质疑声呢?用议会制代替君主制,有人担心,因为千百年来王权如父权一样天经地义;给予工人选举权,有人担心无产者在经济上不独立,在政治上也难以自立;给予妇女选举权,有人担心她们是否有足够的理智,在政治问题上不感情用事。面对电子民主给予民众的参与机会,也有人担心网络匿名在便利网民言论自由的同时,也会出现网络言论随意性、极端情绪化现象,会出现“民粹主义”、“谣言惑众”,从而影响现有的社会秩序。这后一种担心也不全是杞人忧天。互联网作为一种革命性的通讯工具,它确实具有淡化传统权威的特点,无论这种权威是政府、报纸、电视、^④习俗,还是专家教授。其实,信息越充分透明,人们的选择就越多,分歧也会随之增多。

① 数字差距(digital divide)已成为表述这种社会现象的一个术语,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Digital_divide。

②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袖珍本,第125页。

③ E. M. Noam, “Will the Internet be Bad for Democracy?” see http://www.citi.columbia.edu/elinoam/articles/int_bad_dem.htm and Paul DiMaggio, E. Harggitta, W. R. Neuman, J. P. Robinson,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Interne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7, 2001, p. 310. 安德鲁·基恩《网民的狂欢:关于互联网弊端的反思》(丁德良译,南海出版社2010年版)是这方面著作的典型。

④ 传统媒体的衰落是显见的:2009年1月至7月,在经济危机和互联网冲击下,美国有105家报纸倒闭。见 http://www.qcc.cuny.edu/SocialSciences/ppecorino/CISESHV_TEXT/Chapter-12-Political-Change/Study.html 从1978—1998年,用主要时间看电视的美国家庭从90%减少为45%。见 Dick Morris, “Direct Democracy and the Internet”, p. 1033, see <http://www.yoyang114.com/data/2009/10/16/2009101695232amarginj0.pdf>。

网络的“非中心化”也就是多元化,信息多元化、价值多元化、选择多元化,这些都是当代社会要面对的现状和问题。

作为一种科技发明或通信工具,互联网对现存政治秩序具有解构和改善的双重影响,具体是什么影响,影响到什么程度,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是不同的,在同一个社会中的不同时期也会是不同的。如同火药和指南针最初在中西社会中的不同作用,火药可以做焰火或弹药,指南针可以观风水或航海。一切取决于文化传统与民情,所谓政府或社会管理制度不过是文化传统与民情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没有飞机汽车时,帝王出行也无非是骑马坐轿,现代化交通工具最初也都被权贵阶层先享用,都拉大过社会差距。改革开放前,买飞机票要凭单位证明,证明乘客是有一定级别的;轿车更不是普通人的代步工具。相比拥有几个佣人的权贵家庭,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电类产品的发明和普及,对工薪族家务负担的减轻作用会更大吧!十多年前,手机刚面市时,有半块砖头那么大、那么沉,也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谁曾想过它今天成为寻常百姓生活的必需品呢?三十年前,家庭电话还是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志,家庭电话和手机的普及,对当年没有家庭电话、没有秘书或通讯员代劳的普通百姓生活的便利是不是也更多些?互联网上的远程教育不是拉近了国际之间和国内不同地区之间教育水平的差距?

科技发明的出现究竟是缩小还是拉大了社会差距?答案取决于所问的是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或地区,是短时段还是长时期。即使一些科技发明给人类带来过灾难,如车祸、空难、核事故,该负责的也应该是掌控和利用这些发明的人。但从长期看,总体而言,科技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会是类似的。如果我们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那么公民权利的逐渐发展或民众更多地参与社会事务就是其中的规律之一。这一历史趋势既被社会变革所推动,也为各种科技发明所促进。

一百多年前,托克维尔就说过,“翻阅一下我们的历史,可以说我们在过去的七百年里没有一件大事不曾推动平等”。例如,枪炮的发明使平民和贵族在战场上处于平等地位,印刷术使人们平等地获得知识,新教改革使所有人能平等地与上帝交流……因此,他认为,“身分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①托克维尔身后的历史也一再证明了这个道理。互联网不过是最近最明显的一个证明,但它决不会是最后一个证明。

(责任编辑:刘军)

(责任校对:姜芃)

^①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7页。